

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

国外中国

GUOWAI ZHONGGUO

古典文论

GUODIAN WENLUN

研究

王晓平 周发祥 李逸津 著



总 序

傅璇琮 周发祥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世界各国瞩目中华文明时,无不对中国古典文学加以青睐。因为这份丰厚的遗产,不仅荷载着中华文明的精华,而且它自身尤有一种卓尔不群的美质。它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已经形成了一种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现象,为世界文学关系史增添了光辉壮丽的一页。而在中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日益深入的当今时代,建立开放型的文学研究也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作为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理应适应时代的需要,认真把握中国古典文学的这段外播历史,发掘其内涵,总结其规律,使之在推动文学研究

现代化的壮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我们面向 21 世纪的今天,回顾一下本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会产生一种学术上的迫切感,那就是这种研究不能总是囿限在传统的文献范围做文章,新一代学人应当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应当从历史角度回溯中国古典文学由近而远地走向世界的轨迹,而且应当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来审视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触及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特异的文化现象。近几百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象。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识,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协调、相接轨的必要途径。

虽说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必然趋势,但像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外播如此广泛而持久、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者,实在并不多见。也许只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庶几可比,——不过,照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的话说:“希腊衰微了,罗马倾覆了,中国却跟我们同在,而且它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依然如潮水般地涌现着……”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历程,不难看出,实际存在着近播邻国和远播欧美两大潮流。它的流播所至,影响所及,也正是所谓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领域。

中国文学的外播,同任何民族文学的外播一样,始自与近邻的文化交流。韩国史书有箕子入朝、诗书从焉的记载(《东国通鉴》),这就是说,早在殷周之交,它就借助车马舟楫之便,传

入了山水毗连的邻邦。此后它又东渡扶桑，南至菲、越、缅、泰诸国，对于远东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学在邻国的播扬之中，以东渐日本最为引人注目。公元3世纪（应神天皇十五年），儒家经籍由百济传入了日本，这是它东播的肇始（见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那时，日本还没有本国的文字，从外舶来的中国文学便成了唯一的书面文学，也成了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汉文学”的催生剂。关于这种情况，日本学者有所描述：“用这一帝国的共通语——汉语，来表现人类世界所共通的思想与感情，是日本知识阶层理所当然的使命。”（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日本文学不仅借用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代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随着文学思潮的兴替，汉文学作家追随中国文苑新说，步武文坛巨子者，代不乏人。甚至侍宴应制、聚饮唱和、登临抒怀、伤时感事等文人习尚，也以中国为摹本。在假名出现以后，日本的和文学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本土文学依然与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假名的普及，中国文学通过训读本、训译本和意译本而拥有了更为广大的读者。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学纷至沓来，中国文学的地位相对而言有所下降，但它的传播，却借助现代学术而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总而言之，它对日本和其他邻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实属罕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即使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未能像汉语对远东的影响那样，占据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孔雅瑟《亚洲文学》）

中国与欧美相距迢遥，其间且有关山阻隔，中国文学的西播自然起步较晚。一方面，我国汉代曾经开拓西域，发使“黎轩”（《史记·大宛传》），但并没有把文学带到欧洲去。另一方面，虽然早在公元前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提及中国，后

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等人的报导也给西方人民以多种遐想,但直到16世纪西班牙学者门多萨撰写《大中华帝国史》之时,西方史籍才稍稍涉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学。1590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完成了明代童蒙读物《明心宝鉴》的西译,迄今所知,这是中国文学正式西播的肇端。自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得以亲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大量翻译儒经和其他经典,客观上却为中国文学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通过这些传教士,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现了许多趣闻和佳话,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移植中国戏剧,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称赞中国小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翻译《诗经》,均直接间接地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有所关联。进入本世纪以后,全球性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传统信念的震撼,中国作为独立之邦的复兴,西方现代派对异国艺术的孜孜追求,比较文学平行学派的隆然崛起等等——这一切,均给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西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运,使它继而影响到了西方的现代文学,诸如意象派、垮掉派。赛珍珠、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结缘,便是它在西播历程中的新篇章。异质文学姿态别具,彼此间易于取长补短,有着极强的互补性。鉴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一定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中国古代典籍在世界各地的流传,几乎无不是通过学者的译介、注释和研究而完成的,所以它外播伊始就与传入国的学术息息相关。经过长期的积累,在国外首先形成了综合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Sinology);后来渐渐分化,甚至文史、语文的综合研究也渐渐解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横向来看,如今日

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堪称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三大板块。尽管这些学术实体有历史久暂之分,成果多寡之别,但它们无不是既重视译介,又重视研究。两者双管齐下,互相促进,使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一步步走向深入。但中国古典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学者们又不得不力求更加精细地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文学,国外汉学界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均撰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研究,与国内研究相比,明显具有若干特色。第一,这一研究在将中国文学与本国文学互相比照、证同辨异之时,便自然而然具备了比较文学的性质。跨越国界追寻中外文学间的实际联系,辨认中外文学间的似与不似,是比较研究关注的焦点。平行学派倡导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第二,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试验田。本世纪西方此起彼伏的文艺思潮,冲击着各国的学术论坛,中国文学研究亦受其影响。诸如意象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创作主张和批评理论,都曾经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即移植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用于文学研究)也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积极开展起来。凡此种种,无不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国外学者的批评方法、分析角度相对来说较为灵活多变,其文艺观、价值观以及趣味好尚又与我们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所做的结论,很多在国内论坛实属罕见。第四,这一研究经常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瓦西里耶夫(俄)、翟理思(英)等人所撰的中国文学史,均早于国人的同类著作,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研究。又如国外佚书的

著录和考证,国内学者往往不得其便,这是一种占尽地利的研究。再如游仙诗、寒山诗研究,则又常常以不同于国内的文化心态进行观照。第五,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国外绝少关门闭牖做学问的现象,学者们很注意参考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研究成果,在着手做某一课题之前,务求资料详备而后止。他们重视从国际学术的背景上考虑问题,目的是为了 avoid 资料的疏漏、观点的偏颇或者劳动的重复。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点之外,各个学术板块相互比较,也可见出不同的特点。日韩的治学方法受我国传统的影响很深,他们在吸收西方学术的同时,仍以传统眼光大量做注释、考证、校勘、索引等学问,并且做得又深又细。西方学者有不少得益于日本。苏联和东欧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特别重视进步文学的研究,多从社会和历史角度去考察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或思想性。美澳西欧诸国(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喜欢尝试新方法,每每从作品的形式入手,进而剖析作品的技巧和意蕴。他们明显有追随新文艺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倾向。总之,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于采取了移植新观念、试验新方法、开辟新领域、交流新成果等做法,使自己的学术品格具备了现代性与国际性。

既然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是一种历时悠久、横贯东西、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如何着手进行考察,才能窥见其全貌,捕捉其精髓,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呢?

我们认为,要想全面而又系统地把握这一文化现象,应该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两种方法。所谓历时研究,就是从纵向角度去梳理中国古典文学向外传播的历史。如上所述,它在同质文化圈和异质文化圈里的传播情况,是互不相同、各有特色的。不同对象应该不同对待,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但无

论遇到的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应该采用溯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的视角,分别描绘出外播的热点与重心、触媒与契机、途径与方式、际遇与影响。民族文学向国外传播的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件,而是我们对于与之相关的客观存在的理性认识。因此,任何一种有关文学外播历史的描述,都必然与文化观、历史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体察世界文化与文学如百川汇海、既见融合又见分立的总体趋势,才能明辨异国他邦对中国文学何以采取亲疏、迎拒态度的深刻原因,才能透过文学与文化交流那种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的表面现象,去把握其潜在的客观规律。

所谓共时研究,就是从横向角度去清理国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由于国外学者的主客观条件与我们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必然会对某些作家作品、某些文学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他们也常常采用中国古今学者的定论成说,但即使如此,即使论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在那种特殊的学术环境里,也不乏其独有的真知灼见、弘论博识以及可备一说的论断。显而易见,如果单纯地依靠纵向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的方法,便不可能完善地总结这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设立专题,分门别类,横向加以归纳、整理,是一个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果一味地述而不作,引而不论,当然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应该说针对那些纷纭、新奇的论点,辨明它们是正确还是错误,全面还是片面,公允还是偏颇,积极还是消极,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看来,这项工作实际上还具有披沙拣金、采珠集玉的性质。

基于上述设想,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相应地分成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个系列。前者是关于中国

古典文学外播历史的梳理,按照学术板块分别加以描述。但为了说明某一影响的性质,也不排斥通过横向比较进行阐说。后者主要是以文学体裁为单位,整理、归纳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也用一定篇幅来概括说明某一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纵一横、纵横交织的探索,最终能够对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这一文化现象,作出系统深入、全面细致的描述。

这是一项特殊的信息反馈工作,我们坚信,它能够带来多方面的报偿。首先,它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普遍流行的“若无中国文学这块瑰宝,便不得世界文学全璧”的共识,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矢志破除“东归东、西归西”这一顽固观念的伟业,也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各国文学衬托之中的鲜明形象。这些信息不仅启迪着我们长久弘扬中华文明的思想,而且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和地位提供了参照系。其次,它可以带我们进入国外学术研究的氛围,使我们得以窥见形形色色的研究方法,以及林林总总的具体观点。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消说,这些他山之石如能及时引进,一定会有利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实际进展。因为在此揭示的新方法、新视角和新观点,正如中国文学之补益于外国文学,无疑可以开启我们的思路,作为我们积久成习的思维模式的重要补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把切磋研讨国际化,自然可得兼听的好处。所以,对我们而言,学术交流更是文学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再次,它可为文学创作提供參考。当代文学创作不可能孤立而存,总要受源远流长、势能强大的传统的制约与激发。而对于传统,我们又习惯于采取因循的态度,有时竟至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国外的研究,

因为换了透视的角度,对传统多有新见。例如,在《诗经》里寻找意识流手法,在梦窗词里分辨现代派的跳跃式思维,或者否认所谓传统小说心理描写不足的说法,而认为它以言谈举止写心理,更写得心机毕露,情志昭然……这些探索和观点,如达于当代作家的视听,想必会改变对古典文学的传统看法,或许会促使他们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最后,它还可以反馈多种有关的学术信息,如海外佚书、汉学机构、学者生平、学术会议、研究计划等等。这些情况或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是它附属性的种种侧面,若对此有所了解,显然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中外学术的交流。

无须讳言,这一课题也具有一定的难度。由它本身固有的性质所决定,研究者需要涉及较为广泛的学术领域。这就是说不仅要熟悉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还要了解国内有关的学术背景;不仅要把握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史,还要了解国外历代渗入汉学领域里的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此外,在这一学术领域虽然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仍有许多空白急待填补,仍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问题,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再加上这一课题的原始资料大多数在国外保存,可想而知,搜集起来又是何等的艰难!因此我们结成写作小组,一方面互相切磋,集思广益,并且广泛征求专家的宝贵意见,以补偿我们知识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想方设法搜集书文,以弥补原始资料的匮乏。所以,我们的撰写过程,一直是个不断克服种种难题的过程。

最后还有几个技术性问题须加以说明。第一,为便于介绍,我们把国外汉学分作“东方”、“西方”和“俄苏”三大板块,这些名称并不完全等同于地理上的概念;第二,台港学术具有国际性,在此发表的西文著述,可视为西方学术的组成部分,

因此本丛书采而用之；第三，本丛书所涉国外学者极多，为使行文简洁起见，均不以“教授”、“先生”等敬语称之。西方汉学家已取汉名者，即用汉名，而华裔学者所用西名，如“Tames”、“John”，便不再译出。

由于我们的能力有限，水平有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尚祈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无论如何，我们愿意把这套丛书奉献给学术界，以迎接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新世纪！

1995 年 12 月

一部实实在在的书

——《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序

杜书瀛

作为傅璇琮、周发祥两位先生共同主持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书系之一种，由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三位学者执笔撰写的《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一书，即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及该书系中其他著作的出版，无论对于学界还是对于他们个人，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读这本书，我总的感觉是：几个老老实实的学者，写了一部实实在在的书。

所谓“老老实实”，是指作者为人为学的作风。发祥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其他二位也听他讲起，略知一二。他们都是甘愿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的人。本书主笔晓平君，多年来一直从事中日文化与文学交流史研究，执着而又勤恳，精细而又沉潜，因此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并且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了解较多的还是发祥君。我与他过往渐密以至成为朋友，是近几年的事情。十几年前，

当我只知其名而未辨其面的时候,听人说他是学英文的。学英文,接触“洋”的东西多,我以为总会有点“洋”气。当我真正同他有所接触,才发现他不“洋”,倒是有点“土”,一个带着浓浓乡土气息的山东汉子。微胖的身材愈发显得憨厚,脱不掉乡音的普通话更加透露出淳朴。同他接触多了,更感到他的淳朴是发自内心的,是感情深处的,是因于内而符于外的。他为人淳朴,为学也同样淳朴。前年秋天,我应傅璇琮先生和他之邀,到中华书局参加他们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课题论证会,听发祥对他们那个宏伟庞大项目所作的质朴无华的介绍,又在会下同他们多次交谈,觉得课题组合作者们的确是踏踏实实的学者。发祥对德高望重的傅先生十分尊重,傅先生对他的踏实学风也很称赞。对他们那个项目,傅先生纵观全局、高屋建瓴,发祥井井有条、细致周到。最可称道是他们非常重视资料的搜集、积累和翔实可靠。老实说,这个课题是有相当难度的。诚如他们所说,做这个课题,需要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既要熟悉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文论研究,又要了解国内的学术背景;既要把握国外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发展史,又要把握国外渗入汉学领域的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再加上这一课题的原始资料大多数保存在国外,搜集起来相当不易。因此,我想他们会常常感到“内”、“外”交困。面对着这些困难,他们结成写作小组,互相切磋,协同作战,集思广益,又广泛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以补自己知识之不足,想方设法搜集资料,包括到国外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以充实自己的学术库存(他们均曾经出国访学)。就这样,他们以刻苦的精神、踏实的作风、严肃认真的态度,越过了一个又一个障碍。他们老老实实做学问,获得了成功。我不敢说他们写出了一部完美无缺、有多么多么高学术价值的书,但我敢说他们写出了一部

实实在在的书。

所谓“实实在在”，是指这部书的内容比较充实而不浮华。这里没有那些为许多人所看不懂或难以理解的名词术语，没有怪怪奇奇的句子和花里胡哨的词藻，没有虚张声势的褒扬，也没有不负责任的贬抑。这里所有的，只是他们所能搜集到的欧美、俄苏以及日、韩、越诸民族研究和接受中国古典文论的历史和现状；读者可以看到外国的汉学家们如何看待和阐释中国古典文论思想，如何根据他们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接受中国古典美学；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遗产、美学遗产在另一种民族环境中，会有怎样的命运，它们同别的民族的文化思想化合后，会演变出怎样的形态，会发生怎样的效应。这部书的缺点可能是接触面有限，会有遗漏，有的介绍也不够深入。但就所介绍的内容来说，却是敢于对读者负责的。晓平君在本书《引言》中的一段话，可以增加读者对本书的信赖：“本书虽是以我们在国外访学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为基础撰写的，但对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掌握仍不免有所遗漏。”而且《后记》中说：“为能准确展现国外学者研究的原貌，我们避免主观的裁断和简单化的评判。”撰写者们老老实实的态度，使得他们写出来的文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可信赖的内容。

我想，广大读者会喜欢这几位老老实实的学者所撰写的这本实实在在的书的。

1997. 6. 23.

引 言

本书探讨与评述的是中国古典文论在国外的传播、影响与研究。中国古典文论在国外的际遇研究,即在外国被接受的情况及这种接受带来的影响,是本书的基本课题。

接受国文学的传统、现状和趋势,是决定际遇逆顺、影响时机与深浅的客观条件。中国白话小说理论在日本江户时代受到曲亭马琴等读本作者的青睐,李渔、毛宗岗、金圣叹等人获得良好的声誉,这无疑是以江户时代市民文化发展为背景的。同样,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尽管有许多来自日本政治小说理论的因素,但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无人留心,倒是给予朝鲜近代小说积极的影响,梁启超一时成为倍受呼唤改革的朝鲜文学界人士瞩目的人物。由于迄今为止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样相,常以不平等、不均衡、不全面为特征,国外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也常呈现零落、分散、片断的情状。本书虽是以我们在国外访学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为基础撰写的,但对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掌握仍不免有所遗漏。然而我们相信,正如19世纪丹麦著名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在他的《19世纪文学主

流》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比较研究有两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在我们眼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我们探讨的是外国人对中国文论的理解，这两种好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兼而得之。

“接受影响既不是耻辱，给予影响也没有荣耀”（乌尔利希·韦斯坦因）。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视文学为人的外化形式的“人”“文”合一的思维形式、“为人生而艺术”的价值观念、救世讽谏的功能意识、“吟咏情志”的审美标准、视文学为情性的自由抒发且为情性的陶冶与升华的文情关系论等，都曾为某些外国文学家所接受，中国的人文观念也曾是某些域外文人学士的精神武器。朝鲜张维《溪谷漫笔》曾言诗“畅性情之微，探造化之奥，文绣不足以侔其华，金玉不足以比其珍，明可以被管弦，幽可以感鬼神”，言诗虽“一艺之微，而实与大化相沟通”；经国崇文思想还曾为平安时代的日本重视文教的政策推波助澜。然而，接受国不同，或同一接受国而时代不同，中国文学理论的际遇往往有所不同，而且同一种理论在本国与国外的际遇，也并非完全一致。18世纪朝鲜实学派学者李德懋在《青丘馆全书》中曾说：“大抵东国文教，较中国每退计数百年后始少进。东国始初之所嗜，即中国衰晚之所厌，如岱峰观日，鸡初鸣，日轮已腾跃，而下界之人，尚在梦中。”江户汉学者江村北海《日本诗史》也曾说：“我邦与汉土相距万里，划以大海，是以气运每衰于彼而后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李德懋和江村北海都仅以时间为标志来谈论朝、日文学风气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而没有涉及到两国对中国文学与文学理论的选择性问题。中国文论在近邻日本、朝鲜、越南能一时大行其道实非偶然。朝鲜李朝初年社会动荡不安，统

治集团颇有意借儒术而期致国家太平，故大事变革文物制度，以崇儒为当务之急，宣扬“忠君爱国”，杜诗甚为当道所激赏，诗关世教，歌咏圣德，美刺时政，遂为常谈；朝鲜正宗宣皇帝《弘斋全书》言“诗者，关世道，系治乱，隽永冲融者，治世中和之音也”。同时，中国古典文论在域外的流传，又有赖于各国民族文学的风潮流转与演进需要。明后七子的复古诗论、袁宏道的性灵说与清代调和诗说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李朝时代的朝鲜和黎朝时代的越南先后各领风骚，便与各国民族文学形式的雅俗更替、新旧沉浮风气相互呼应，互为声援。

近代以来，各国学者从不同的视点来研读中国古典文论，不再以指导汉诗文的写作与鉴赏、丰富本民族文学理论为目的，而是作为一种对外国古代文化的学术研究，去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面目。各国学者包括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华裔学者在内，视野不同，角度不同，好恶不同，然而他们的阐述，无不操着不能与本国文化传统截然割裂的独特的准绳，无不成为从属于本国学术肌体的细胞与因子。这些成果之所以于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也正在这里。我们也知道，这些阐释，毕竟不能代替我们的开掘。阐发中国文论的真价值与真精神，今天中国的研究者具有特别的责任，而这恰是单纯袭用他邦的规矩绳墨所不能解决的课题。

阅读国外研究中国文论的成果，正像读其他前人的著述一样，不可抛弃批判的精神。钱钟书曾谈到日人遍照金刚所著《文镜秘府论》“实兔园册子，粗足供塾师之启童蒙”（《管锥编》，1449页），又曾指出西人引述陆机《文赋》因“移译者蒙昧无知，遂使引用者附会无稽”（《管锥编》，1177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学思想的交流常常伴随着误读和曲解，在研读者误读与曲解的背后，除了个人的学识与其时交流水准等因素之外，